

辽宁舰,五岁了(上)

◆ 黄传会



■ 辽宁舰昂首远航
新华社

有段日子,机电长楼富强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舰上锅炉的一个难题将他难住。向专家提出质疑,答复是:“原设计就是如此,不能动!”

楼富强没有轻易相信这个“不能动”,更没有被这个“不能动”吓唬住。他带领部门的舰员们,没日没夜地奋战在机舱里,对图纸,查管线。一次次假设,一次次计算,一次次推倒重来……

楼富强成功了,成功地降低锅炉启动蒸汽压力,在提高装备安全性能的同时,也缩短了启动时间。

专家们十分钦佩,说:“蒸汽的气压这么低,锅炉依然能启动,作为研制者,我们都没有想到!”

辅机部门的刘辉,有一天,面对密密麻麻的管道,一个疑问爬上脑海:这么多机组产生的冷凝水,怎么只有一条管道、一个阀门?万一管道或阀

门发生内漏,海水岂不进入炉水?会不会是辅机冷凝水系统设计有问题?刘辉怕自己把管路图画错了,又钻进机舱,忙了几天,更坚定自己的疑问:冷凝水系统设计存在隐患。

刘辉发动战友集思广益,很快拿出一份改进方案。

就在这时,某号机组冷凝水系统发生海水渗漏,幸亏发现及时,才避免一场事故。场方专家根据刘辉他们的方案,改进了冷凝水阀门。

凭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辽宁舰百分之百的舰员通过了相关厂所和院校的各种接装培训考核,获得上舰资格认证。他们还先后向建造部门提出了数以千计的建议和方案。

2012年4月20日,作为全舰最复杂、最庞大的部门,机电部门的

官兵全面接管前机舱,率先实现独立操纵装备。这标志着舰员们可以自己驾驭战舰驰骋在万里海疆上——而这一天,离接舰部队组建才刚刚两年半。

辽宁舰入列之初,很多专业人才缺乏。官兵们开玩笑说,骨干大多是“独生子女”,想找个“双胞胎”都难。

舰载机首次起飞时,合格的起飞助理只有陈小勇一人。如今,他已经带出数名徒弟,且均能独立上岗。“航母放鹰人”、二级军士长张乃刚,也带出好几名能够独立值更的起飞站操作员。

最初的各专业“首席”身后,迅速形成一支由多名骨干组成的“王牌团队”。

外电预测,即便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下水了,与之配套的舰载战斗机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仅仅过了

两个月,我国自行研制的舰载战斗机歼15在辽宁舰一飞冲天。

早在辽宁舰入列前六年,舰载战斗机部队已提前组建并开始训练。戴明盟有幸成为第一批舰载机飞行员。

舰载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航天员的五倍、普通飞行员的二十倍;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大国十年间就摔掉一百零五架舰载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事故发生在着舰时;世界上飞行员数以万计,而现役舰载机飞行员只有两千余人……

如果没有玩命的勇气,没有拎着脑袋干事业的劲头,当不了一名舰载机飞行员。

戴明盟刚到舰载机部队时,歼15尚未交付部队。戴明盟他们等不及了,便借用其他机种代练。说是代练,其实谁也不知道舰载机应该怎么飞,国外对这一技术封锁得像铁桶一般,一切只得从零起步。戴明盟曾经感慨地说:“别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可我们连可摸的石头都没有,只能一步步蹚水前进。”

航母上跑道不及陆基机场跑道的十分之一,且处于运动状态,舰载机起降,有一套完全区别于一般战斗机的着陆操纵技术。陆基战斗机着陆是收油门减速,舰载机着舰却要推油门加速,准备挂索不成功时再次起飞逃逸。必须改掉原来已经形成的习惯动作,从头再来学习“反区操纵”。

歼15终于交付部队,戴明盟知道,赋予舰载机生命和战斗力的,是飞行员。

没有教练员,人人都是教练员;没有教程和标准,所有的教程和标准都在飞行中摸索。

在两年多的舰载机适配性飞行中,戴明盟和他的战友们共进行了多达数千架次的起落,创造多项我军新机试验试飞的纪录。

试飞英雄

张子影

9.艰难的着陆

其实,飞机从刹车抱死到离开地面,一共才10秒时间,然而,机组成员感觉这是人生中最长的10秒。这其中任何一秒之内的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会机毁人亡。同样,如果机组人员有任何的恐慌,都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他们的飞行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了。

飞机一离陆,机组立即启动4发,准备着陆。此时,塔台由刚才的凝固一下子像被引爆了,大家迅速分头行动,为飞机着陆创造最佳条件。地面指挥员大声通知空中和地面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并要求飞机低空通场两圈,让地面观察飞机的状态,特别是轮胎的情况。

第一次通场,飞机高度100米,但地面没有看清楚,要求再通场一次。

第二次通场,试飞员们下了狠心,飞机离地高度只有11米。地面终于看清了,通过无线电告诉试飞员:“左侧机轮爆胎。”

这种险情,在中国飞行史上绝无仅有。鉴于飞机在近乎满油的情况下,按照降落要求,指挥员指示他们先进行空中耗油。

刘学岩通过无线电明确地告诉塔台:“不耗油,马上落地。”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刘学岩此时清楚,虽然空中耗油可以减轻飞机重量,对着陆更加安全,但现最重要的大家的心态,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会增加一份不可预知的风险。飞机对准了跑道,准备降落了……

地面上,消防车、急救车等应急车辆已准备到位。

飞机以轻柔的姿态,如蜻蜓点水般滑向跑道。不愧是一个“老到”的机组!由于左侧轮胎爆胎,他们以右侧机轮先着地,并保持飞机2度的坡度。飞机上,两名驾驶员齐心协力,共同保持住飞机姿态,领航员报速度,空中机械师报发动机状态,配合得相当默契。当飞机稳定后,他们才将飞机的左轮轻轻地放下。

飞机“软着陆”成功,飞机安全了,他们拼回来了!



正在试飞现场的试飞院葛和平副院长和郭平凡副院长迅速赶到了飞机旁边,当机组走下飞机时,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此时,大家已没有更多的话语,就这么紧紧地握着,好像一松开就会彼此失去一样,大家的眼中全都噙满了泪水。

他们就那么牵着手,互相紧紧地牵着,回到跑道上查看情况。

阳光很明亮,灰色的跑道上那条130多米长的拖痕和6个深深的黑色印迹,一览无余。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风从他们身边吹过,4月暖暖的阳光,跑道两边返青的碧草,预报有飞行的黄色标志旗——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却又是那么亲切。

试飞员们都不擅长抒情,过了一会,不知是谁先说了话:

“要我谈,单从动作上讲,今天的降落可以给咱打5分。”

“反应也可以打5分。”

有人带头吹起了口哨,他们吹着口哨往回走。

春风将这优美的哨音吹得远远的。

那一次的特情发生完全没有预兆。张海机组进行的是加油机的出厂试飞。

本来,试飞的科目完成得很顺利,他们顺利返航,向指挥室报告高度速度后,他们已经看见跑道那条灰色带子了。

飞机加入着陆航线,放起落架,降低高度。高度降下来了,但起落架只放了一半就停了——此刻飞机保持着下降速度,转眼间,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跑道越来越近,眼看着灰色的带子升起,迎面而来,着陆点就在眼前了,但塔台指挥员发现前起落架只放下了一半,还是没有完全放到位。

“加油门带杆!”危机时刻,张海果断选择了复飞。

复飞通场进行第二次着陆,然而起落架还是放不到位。眼看天色越来越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张海意识到,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张海心里念叨的同时思考着接下来的处置措施。

弃机跳伞还是尝试着陆?一番考量之后,张海选择了尝试着陆。

9.回家(上)

过往的陌生人,我经常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脸和眼睛,猜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面相可以吐露秘密,但看见的那一点点仅仅是神秘世界的入口,进去了才会知道里面是怎样的曲折幽深。

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普普通通,其实哪一个人心里没遇到过极难的关口,不曾反复掂量过这个现实的世界。人走一遭,八九十年,都会有难以言说的艰辛和痛苦。他不张口,外人便无从得知,而一旦得知,便是震撼。

我的采访,仿佛让我拿到一张通往别人内心的通行证,我幸运地跟着他们,坐着他们的独木舟,在他们的世界里一起抉择、穿行、体验。

暑假中我采访到一位年过八十的老者高秉涵。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沉浮颠沛,尽一切努力不被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翻——活下去。他的一生很辛苦,躯体的苦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折磨来自内心。

父亲为国民党工作,母亲在1949年亲手把他送进退往台湾的人流。

一个13岁的少年,在家里母亲、姐姐护着宠着,享受着家庭的爱。突然一夜间,他就变成了一个流浪儿,夹杂在人心惶惶的溃败队伍中。再没有人嘘寒问暖,是冷是饿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是命,活不下去也不会引起丝毫涟漪。

文明的外衣在丛林中已经不再需要,高秉涵在逃生的队伍里经历着文明向野蛮的蜕变。他为了抢到一碗粥,烫伤了自己的腿,伤口溃烂生蛆,用烂布简单裹上,用尽13岁少年所有的力气,挤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逃难是个过程,经过歇斯底里的争抢后,总算在船上找到一个相对安宁的空间,而即将到达的目的地又是新的未知和争抢。台湾岛不是天堂。无依无靠地上了岸,有吃的,能住下,才能活。而这些对一个没妈的孩子,无异于又把他投进了危险遍布的丛林。

没能力创造吃住,就从垃圾场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高秉涵在垃圾场和野猫、野狗争抢食物。后来遇到了大陆来的乡亲,介绍他去

火车站做小工。一点点,做工,读书,工作,算是走上了正轨。十几年过去,少年变成青年,又变成中年。高秉涵的心却始终停留在13岁时与娘分别的那一刻,他需要妈妈。不是脱离不了母爱,从山东菏泽往台湾去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脱离了母亲的庇护瞬间成人;他需要的是归属、是依靠、是寄托。

高秉涵从垃圾场里与猫狗争食,到考上大学,再到政府机关工作,他每天都给娘写信。他知道这信到不了娘手里,但他仍然写,他要告诉母亲他的改变,他的进步,也要记住老家点点滴滴、亲人、邻居、小狗、鸽子……没有照片,就用笔描述出一切。但是每封信里都有两个字:想娘。

生命的前十三年,天天与母亲在一起。母亲围着他,给他做吃的、做穿的,教他读书写字,教他规矩分寸。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到老再告别。但他绝没想到,前一刻还在眼里,转眼就看不见了。平时上学拐个弯也会看不见,看上去几乎一样:早上吃过母亲做的饭,背起书包,抬脚就跑,也是这样离开母亲的视野;这次也是,一个小包裹裹着路上的全部,就那么上路了。那一别,儿子就再没有回头,再不会回家。儿子有多疼,母亲就有多疼。

把儿子送走,想到儿子在逃难队伍中要受的罪,想到逃到台湾去的孤独无助,母亲夜不能眠。死算什么,死的痛苦只消一会儿,结束了就不再有更多的想象,一死百了。跟死相比,这种思念,知道对方在却没有任何方法能让对方知道的思念,要痛苦上不知多少倍。

高秉涵自己都没想到,想娘的心会越来越重。以为年纪大了,娶妻子会让他淡忘,但每往前走一天,心里的负担就沉重一克。

在两岸隔绝的日子里,他利用到国外开会的机会,想给山东菏泽的家里去一封信。信写好了,揣在怀里,愣是没敢寄出去,因为走前领导千叮万嘱咐不能跟来自大陆的人交流,也不能往大陆寄信。一共“六不”,紧箍一样缠住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高秉涵看着大陆来的学者,仿佛个个都是乡亲,仿佛个个都跟母亲有关,他想拉住他们仔细问问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但也只能想想。

懂得

董倩

